



西藏问题研究丛书

中英西西藏交涉

与川藏边情

1774—1925

阿克薩姆山口
15400
巴列嶺
羊卓雍湖
Yamdro Tso
14350



中国藏学出版社

冯明珠 著



D829.561
8

D829.561
8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 —1774—1925

冯明珠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冯明珠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2

(西藏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80057-934-9

I. 中... II. 冯... III. 中英关系-西藏问题-国际关系史
-研究-1774-1925 IV. D82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1855 号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1774~1925

冯明珠 著

出版发行: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7.25

印次:200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67千

书号:ISBN 978-7-80057-934-9/D·22

印数:2000册

定价:31.20元

台湾版原序

王曾才

西藏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它究竟难解不难解，是神秘莫测的香格里拉？还是乱力鬼神的出没之所？或者，它是有其自身传统与发展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其自身历史与文化的人民？

西藏这个名称，在清代康熙年间始固定下来。在明代时，它叫“乌斯藏”，在此之前，则以“吐蕃”之名著称于世。这个位于亚洲内陆，为喜马拉雅山脉群岭所环抱的“世界屋脊”，在7世纪建立吐蕃王朝后，便与大唐发生了关系。文成公主的下嫁松赞干布，不仅是哀艳的中国和亲诗篇中充满特色的一章，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甚至整个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佛教也因而传入，并在15世纪初叶经宗喀巴（1357—1419）的改革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13世纪时，蒙古人进入西藏（当时称“吐蕃”或“西蕃”），并入元朝版图，一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17世纪时随着清朝的兴起，逐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清世宗时（约为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设置驻藏大臣。

有清一代，为近代世界历史变动最大的时期。此期内，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政治版图的确定，虽然奠下基础，但“欧洲

的扩大与世界的欧化”所表现出来的西力东渐，也排山倒海而来。“七年战争”（1756—1763，清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判定了英法帝国争霸战的胜负。英国在控有印度之后，便大肆向西藏的方向扩张，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英印当局便与不丹发生冲突。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平定廓尔喀（即尼泊尔，因其侵入西藏），英国却于此年与尼泊尔签订通商协定，其势力介入藏边。但也就是在同一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马戛尔尼（Lord Macartndy）使华，并且在同年9月8日颁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也提及要他就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善自解释，以去除中国的疑虑。但清廷上下此时所计较的，却是觐见仪节的跪拜问题，马戛尔尼根本没办法就双方利益攸关之事，与中国官员交换意见！当然，此因中国官员根本不认为有何利益攸关之事！以后的发展，够令人慨叹的了。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才进入另一个新阶段。

明珠聪慧而勤勉，她自1975年左右对西藏问题发生了浓郁的兴趣，此后念兹在兹，用功甚深。最近完成大著《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一书，涵盖的范围自1792年的廓尔喀之役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叙述详尽，分析透彻，诚属不可多得之作。读完全书之后，我们会发现西藏既不是神秘莫测的香格里拉，也不是乱力鬼神的出没之所，而是有其自身历史与发展的土地与人民，并且很值得去了解。

乙亥初春，台北安之居

自序

冯明珠

闯入藏学研究的园地,是偶然、是必然、也是机缘。记得 1975 年秋,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心中并没有具体研究计划,方向则隐约呈现脑际。我生在香港,童年及青少年时期都在那儿度过,但我的父母非常不认同英式殖民地教育,为了让孩子们远离所谓的“洋化(或奴化)教育”,他们费尽心思,将我们一一送到调景岭就读(因为这里有中国设置及协助设置的学校)。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离开父母,跟着外婆及一位远房表姐来到此地,进入天主教鸣远中学(当时鸣远中学含中学、小学及幼儿园,但统称中学),直到上中学二年级,始因种种变化,返回香港就读正规的一般中学。可能因童年的际遇,使我对中国近代史与大英帝国扩张史特别感到兴趣。进入台大历史系,除了选修英国史、美国史、东南亚史外,花了许多时间在文图、研图阅读英国史书,发现原被史家极力批评的殖民政策,在 20 世纪中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战乱相继发生后,起了很大的变化,迫使论者不得不对殖民政策重新加以检讨。进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便毫不迟疑选修了王曾才老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题研究”,盘算着追随老师研究中英关系。王老师授业,并不滔滔主讲,而是由学生各择一题,自行研究,撰写论文,在约定时间里上台

报告,同学质询,老师评论。我便是因这门课踏入藏学领域,至今已有19个年头了。

选择《中英西藏交涉》撰写报告,也与方豪老师有些关系。在“西方汉学名著选读”这门课上,老师经常训示选择研究方向的三原则:(一)崭新的主题;(二)能言前人之所未言,提出新见解;(三)新史料的发掘与应用。我天资驽钝,选择了后者。当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庋藏的《西藏档》,初步整理完成,开放提阅。利用这批史料出版的论著并不多,值得深入探索,也可应付课业,因而试着去翻阅。孰知一触手便落入浩瀚的史料中,深深被这些原始文件所吸引。开始一周两三天赴“中研院”的抄档生涯,断断续续地抄了一十五载,直到1990年近史所方允申请复印,而我已利用这批史料于1978年完成硕士论文,也从此进入西藏研究领域。本书征引的《西藏档》,多是我一字一句抄得,至今藏案抄档仍堆积案头。回忆往事,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在近史所阴暗的旧档案室里,通常只有我与管档案的王世流先生对坐。王先生沉默少言,除了午睡片刻,几乎终日埋首剪贴修补档案,我则伏案振笔直书。依当时院方规定,中午12时至2点是午休时间,但为了方便于我,王先生特别允我继续,他则以午睡鼾声相伴,唯一要求是提早半小时打烊,他老人家于四点半赶公车回家,可免塞车之苦。王先生已退休多年,近史所也盖起新厦,档案在新厦里有了专室,管理提调人员也多了一些,且开始有影印服务,一切都方便多了,但撰写此序时,脑中出现的竟还是一老一少对坐在阴暗档案室里的场景。

严格说来认真地踏入西藏研究,是在史研所毕业以后。1978年7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近代中英西藏之交涉——光绪二年至民国十三年》,也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但对这本匆匆赶成的论文,十分不满意,虽得大姐之助印了一百本,但除了应缴校方的定额外,未肯外流,亲朋索取,也多婉言拒绝,并开始检讨得失,于毕业两个月后,在《思与言》双月刊正式发表了一篇有关西藏研究的论文——《中英西姆拉会议》。同年12月,我进入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从事《清史稿》校注工作,接触到故宫所藏清代档案与善

本旧籍,越发觉得硕士论文征引的不足,于是乘校注工作之便,着手翻阅档案,于1980年在《故宫季刊》发表《光绪朝中英西藏交涉》,对清政府的治藏政策提出检讨。1982年更因校注《清史稿·四川土司传》,大量翻阅方志,先后完成《读校清史稿四川土司传》、《西康建省的渊源——赵尔丰与川边土司的改土归流》二文,对清末民初川边情势,以及中央与西藏关系有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当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要将拙著《中英西姆拉会议》收入《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三编《民初外交》时,我主动向编辑委员会召集人王寿南教授表示,我愿意改写。于是一篇原约两万字的论文,被扩充了一倍,对1913年西姆拉会议的本末经过、成败得失,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叙述。国人对清代版图的坚持与确认,以及对川边与西藏的感情,是民国初年中、英西藏交涉久议不决的原因。

1986年“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现已更名民族研究所)藏学组,结合有志于藏学研究者,组成“西藏研究委员会”,分语文、历史、文化、现况四组,进行合作研究,每月举行学术交流活动,由与会委员提出个人研究心得,或请学者做专题讲演,每年出版两期《西藏研究会讯》及一辑《西藏研究论文集》。我有幸于1987年元月起,应当时边政研究所林恩显所长及萧金松教授之邀,参与其中历史组,自此以后多了一份鞭策我的力量,除了要提出年度研究计划外,每月举行的交流活动,更开阔了我对藏学的视野。《析论清季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兼述19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境域及藏印边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及川藏边情》及《北洋政府时期的中英西藏交涉——从五四运动到华盛顿会议》等论文,便是在参与西藏研究会的5年中先后完成的。

1987年除了应邀参与“西藏研究委员会”外,我的研究范围也由清末民初回溯至乾隆朝,利用故宫所藏《廓尔喀档》,探究18世纪末藏印边情,因而对喜马拉雅藏族活动区感到浓厚的兴趣。在这年冬,以自助旅行方式畅游了克什米尔(Kashmir)、大吉岭(Darjeeling)、不丹(Bhutan)、尼泊尔(Nepal)等地。12月隆冬的达尔

湖(Dal Lake),游人几乎绝迹,偌大的一艘船屋旅馆(Ambassador Houseboat),只有我一个旅客。船屋主人,一位七十多岁的甸老先生(Mr. Din),每天带着我闲逛斯利那加(Srinagar,克什米尔的首府),细说着克什米尔的故事。这次旅程中,原计划由斯利那加飞往列城(Leh),可惜山区气候恶劣,飞机停航;通往列城的公路,每年八九月后便告封锁,使我至今无缘前往拉达克(Ladakh)。

离开克什米尔,我照原定计划飞往大吉岭。当我在新德里(New Delhi)订购机票时,旅行社的服务员告诉我:大吉岭正有乱事,已进入戒严状况,为了安全,最好别单独前往。我则因对大吉岭向往已久,错过了拉达克,不能再过门不入大吉岭,况且与好友葛婉章有约,必须勇往直前。说到葛婉章,我真该感谢她,若非她的胆识、毅力与邀约,我的喜马拉雅山区之旅不会如此顺利,也不可能在那年头里,取得不丹个人观光签证。1988年元月,我顺利抵达大吉岭,在那儿访问了各行各业藏族朋友。

这趟旅行中最叫我感动与震撼的是不丹。现代不丹是君主立宪国,国王吉美辛吉·王卓(Jigme Singye Wangchuck)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于1972年登基,是一位颇受国人爱戴的年轻(登基时24岁)君主。国土面积1.8万平方英里,人口约120万,以近似藏语的宗加语(Dzongkha)为通用语言,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多通英语。不丹国王虽受西方教育,却拒绝西方文明,此地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甚至没有报纸。所谓国际机场,根本没有导航系统,全凭驾驶员飞行经验,气候不好,能见度不佳,就得停航。对外主要交通是公路,但不丹政府规定,外国旅客(印度人除外)不准由陆地前往。为了国家收益,不得不利用观光资源,但不接受个人申请,所有观光客必须通过国家旅游局(Bhutan Tourism Corporation)安排。我之所以能够成行,是因为不丹驻新德里大使馆,经不起葛婉章一再请求,反复申诉,才同意将我俩与一位丹麦女子组成三人小组,由国家旅游局依照我们的意愿安排一星期的旅程,由位于不丹西部首府廷布(Thimpu)向东行至中部折返,沿途除喜马拉雅山城天然风光及不丹人文景观外,主要参观的是一种称为“宗”

(Dzong)的藏式传统建筑。

“宗”原是集政教于一身的藏族僧院兼城堡,不丹最老的一座“宗”,称为“锡土嘉宗”(Simtoha Dzong),由不丹第一位神权领袖拿旺南迦(Ngawang Namgyal)在1627年所建,位于廷布市郊,奠定了不丹“宗”建筑群的典范。拿旺南迦是西藏竹巴噶举派高僧,于1616年来到不丹。当时不丹没有统一的王朝,拿旺南迦统一了不丹,引进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也将与政教合一相关的“宗”建筑引进。位于廷布市区的塔西度宗(Tashicho Dzong),便是今日不丹国王、中央政府与宗教领袖驻锡处。抵达不丹第一天的黄昏,便拜访了塔西度宗。时值隆冬,政府移至中部较温暖的“宗”里,偌大的建筑群里,空无一人,格外清幽,寒风习习,仿佛坠入时光隧道,感受着远古的西藏风情。

1987—1988年的印边三小国之旅中,独缺锡金(Sikkim),原因是当时锡金并未开放观光。1990年,印度政府鉴于内乱频繁,观光业一落千丈,乃决定这年元月起开放锡金,以广招徕,我在当年9月前往。锡金位于喜马拉雅东麓,西与尼泊尔交界,东与不丹及中国西藏为邻,南为印度孟加拉邦,原始居民称为Lepcha,约在13世纪由阿萨姆(Assam)移入。到了15—16世纪,藏族的一支菩堤亚人(Bhutia)开始移来,也带来了藏传佛教。1642年,达赖五世派彭错南迦(Phuntsog Namgyal)到达锡金,创建了锡金王国,开始了南迦(Namgyal)王朝,这是清代藏人主张锡金是其属地的缘由。1861年,英国势力扩张至印北,锡金国王被迫接受其“保护”;29年后(1890年),清廷也无奈地接受了这项事实,与英国议定西藏与锡金的界线,引起西藏对清廷的不满及一连串边界纠纷(详见正文),但被迫接受英国“保护的”锡金王室,仍心向西藏,大力提倡佛教。英国为了抵制锡金统治阶层及开发锡金,大量引入尼泊尔茶农,最后使原住民(Lepcha & Bhutia)成为少数。1947年,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在锡金的权利。1950年锡金国会成立,1955年制定宪法,1964年老国王去世,太子Chogyal Palden Thondup Namgyal继位,成为锡金末代国王,在位8年,于1972

年因癌症病逝于美国。其实在这位末代国王病逝前，锡金国事已非，统治阶层的藏族已为少数，新移民占全国人口的 75%，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致使新国王无法产生，终导发 1975 年锡金动乱，印度出兵镇压，改组国会。在新国会的投票下，锡金正式归并印度，成为印度 22 邦之一。Chogyal Palden Thondup Namgyal 长子宣布逊位，不久死于车祸。

旅行期间一面阅读锡金历史，一面浏览锡金风光，也访问了一些当地居民，真是感触良深。今日锡金首府甘托克(Gangtok)，已变成一座印式山城，西藏风情仅残存在市郊的“宗”里。我恍然领悟到，克什米尔、旁遮普(Punjab)两邦要求印度中央政府立法，严禁他邦居民移入的道理，深惧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家乡的异端与少数(克什米尔是回教、旁遮普是锡克教)。

我因研究近代汉藏关系及中英西藏交涉史，对西藏产生了无限的关怀。近年来藏独问题经常出现脑际，也必须面对亲友们的质询。对我而言，如何保存西藏文化远比西藏应否独立来得重要。世局的变幻，似乎已破坏了许多原被世人认定的法则，一个民族的命运似乎已不能全然自决，必须考虑四周环境及主客观因素。西藏应否独立，不单纯是达赖喇嘛的意愿，或西藏民族自决问题，它涉及中、印两国政府的态度与立场，更关系着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居民的意愿，稍一不慎，即可触发冲突，战争对人世的摧残，则是世人最不忍目睹的。

离开了锡金，我按计划穿越印、尼边域，由陆路前往加德满都(Kathmandu)，希望亲自体会一段印藏通道。虽然已是 20 世纪末叶(1990 年 9 月)，这条路对一个非本地的单身旅客来说，仍是十分不便与险恶的。在 Siliguli 前往 Raniganj 印度边境小镇的路上，曾遭人拦车勒索，全车乘客包括司机先生在内，每人缴纳五至十卢布不等。我向同车会说英语的人询问，才知道拦车人收的是一种变相的过路费，他们称为“政治献金”。离开了 Raniganj，徒步走入尼泊尔边城 Kakarbitta，在那儿办通关手续，才知道自 1962 年中印战争爆发以来，持中国护照不能由印度经陆路进尼，我拿的

虽是“中华民国”护照，但因有“中国”字样，也不能通关。当我拿出香港签发的英国护照，虽可过关，但关税则比别国高出许多，索价20英镑（持它国护照关税为10元美金）。我追问原因，关员告之：政府规定，凡持英国或英联邦护照收费便高，因为英国自19世纪以来便欺压尼泊尔人。对我而言，多付一些钱而能通行，已是万幸，因为折返的路途更艰难。

自Kakarbitta通往加德满都的公路，沿着Mechi River蜿蜒，险峻处一面是峭壁，一面临河川，河水因9月季候雨暴涨，湍急而壮观，路面则被风雨冲刷得坑洞处处，车行其上，颠簸异常。我所乘坐的巴士，轮胎爆破两次，走走停停了17小时，才抵达目的地。我前后两次造访加德满都，一次是为了体会前人的征途，一次是为寻找资料。我初时的想法，故宫既保存有清代遗留下来的《廓尔喀档》，尼泊尔当也应有清代文献。1988年我初访尼泊尔国家档案局(Nepal National Archives)，馆长Balram D. Dangol告之：尼泊尔确有18世纪以来两度与中国战争（指乾隆、咸丰两朝廓尔喀之役）史料，但属外交部密档，非特别许可不能提阅，影印是被禁止的。我因停留时间有限，申请提阅是不可能的，便在Balram馆长推荐下，购买了几部利用这批档案撰成的史书，这也是本书第二、三两章能顺利完成的原因。

1992年，本书的各章节终于完成，在绘制地图的同时，我向院方询问出版的可能性，很高兴副院长，也是《故宫甲种丛编》的主编昌彼得先生，欣然同意，并交付审查，使这本书得以问世出版。自进故宫任职以来，昌副院长对我的提携与爱护，指导我“敬业乐群”的做事原则，使我受惠良多，在此特别向他敬表谢忱。陈捷先老师宽厚地给予本书评论，指点我将第三章由六七千字，扩充至成书规模，并令我为书中所用专有名词，添加解释性注脚，使本书能顺利通过审查，在此我也要向陈老师深表谢意。领我进入中英交涉史领域的王曾才老师，多年来每当在学术场合中相遇，总是对我治学垂询有加，并慨然为本书赐序，使我深为荣幸与感谢。故宫图书文献处处长，也是我工作上的直属长官吴哲夫先生，十分关心本书出

版进度,使我不敢松懈;辅仁大学历史研究所权淑懿小姐协助抄录全书,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卢雪燕小姐帮忙校对,我也在此向他们表达谢意。外子戴晋新先生,对时下书中的感谢俗套,一向最不以为然,但我还是要谢谢他,谢谢他多年来对每篇拙文的关注。

这本书经历了 19 个年头的凝结伸延,即将出版。当我撰写此序时,回首从前,最叫我思念的是离开我多年的父母。记得父亲读完我的硕士论文,摇着头,带着笑意对我说:“在你的笔下,帝国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也有了好的诠释。”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并与一同成长的兄弟姐妹共享。

1995 年 11 月 18 日

台北故宫博物院

凡 例

一、本书以公元纪年，中西历换算是根据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为保存征引资料原貌，注释中不作换算。

二、《导论》是将全书论点作一概述，不另附注。

三、专用名词，如三大寺、商上、噶布伦、达赖、班禅等，正文第二章以后第一次出现时，附注略作说明。

四、中西人名、地名及专用名词，若有需要，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现时，附英文对照，书末并附中英文对照表。

五、注中仅录书名、篇名、档案名称，出版资料详见征引书目。



无从叙说	001
溪州往事	043
古人一条街	056
忧伤的壶	094
一个村妇的美丽阴谋	131
师生故事	140
彩条	148
后记	236

三、《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与《中英会议藏印续约》的 签订·····	(117)
四、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与英军人藏·····	(123)
五、《英藏条约》的签署·····	(128)
第五章 印度会议与中英西藏交涉中的“主权”问题·····	(137)
一、印度会议召开的背景·····	(137)
二、唐绍仪力争治藏“主权”·····	(140)
三、“中英新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与评估·····	(146)
四、“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的签订与评估·····	(150)
五、结语·····	(160)
第六章 张荫棠的西藏善后施政·····	(163)
一、二十四条西藏症结问题·····	(166)
二、十七条西藏善后刍议·····	(168)
三、创设九局及植物园·····	(170)
四、十六条西藏急须待办的善后措施·····	(176)
五、结语·····	(183)
第七章 赵尔丰与川边土司的改土归流·····	(185)
一、巴塘变乱·····	(186)
二、赵尔丰的改土归流新政·····	(191)
三、川边土司的改土归流·····	(198)
四、西康建省·····	(222)
第八章 清末民初川藏边情·····	(226)
一、川军入藏达赖出亡·····	(226)
二、达赖十三流亡印度期间中英西藏交涉·····	(235)
三、西藏新政·····	(240)
四、辛亥革命与西藏政情·····	(252)
五、民国肇建对西藏事务之因应·····	(266)
第九章 中英西姆拉会议·····	(273)
一、西姆拉会议召开的背景·····	(273)
二、西姆拉会议的经过·····	(283)

三、西姆拉会议的失败·····	(306)
四、结语·····	(310)
第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西藏交涉及川藏边情 ·····	(312)
一、西姆拉会议的延续·····	(312)
二、中国对德宣战与川边战争之再起·····	(321)
三、川边议和·····	(331)
四、北京议约·····	(339)
五、巴黎和会对中英西藏交涉的影响·····	(345)
第十一章 华盛顿会议期间西藏政情与中英西藏交涉·····	(356)
一、藏事会议的召开·····	(356)
二、李仲莲、朱绣使藏·····	(364)
三、柏尔使藏与英国的西藏政策·····	(369)
四、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与西藏问题·····	(376)
五、结语·····	(394)
第十二章 中英西藏交涉暂告落幕·····	(397)
尾声·····	(404)
附录一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	(405)
附录二 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407)
附录三 英藏条约或拉萨条约·····	(410)
附录四 中英新订藏印条约·····	(414)
附录五 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	(416)
附录六 西姆拉会议草约·····	(420)
地图目次与说明·····	(422)
征引资料·····	(459)
图版目次·····	(474)
中西人名暨专有名词对照表·····	(517)